

# 達賴喇嘛的流亡生活

果照

七年來長期茹素

果照按：這篇純以客觀立場，綜合事實的報導文字，一句一字，完全依原有詞句，筆者不敢也不可加插個人的意見；也絕對要尊重達賴活佛的每一字句談話，不能歪曲他的或改動他的每一個字的含意，這是很重要的。

世事本來就是無常，國際風雲，變幻莫測，巴基斯坦和印度，幾年來，發生一些小波浪，雖未釀成國際性的風暴，至少，直接或間接，影响了小國人民生活和宗教信仰。

## 喇嘛逃亡經過

孟加拉的分離運動，發展為武力叛變而成了獨立國家。顯然是由大鼻子幕後策動，並得到印度公開支持，他們這樣做，主要是針對中共形成包圍圈，中共爲了防止大鼻子下一步棋，於是通過有關人事，暗中向住在印度的達賴伸出友誼之手，給予好些優厚條件，請他回西藏去，恢復他政治、宗教的雙重領袖。這不是中共對佛教政策有何改變，而是爲了防止流亡國外的達賴受人利用，成爲孟加拉第二。所以，近年來對西藏佛教的改革，一切都緩和下來；但是，達賴不致會輕信任何方面的甜言密語，也不敢貿然回去西藏，自然也不會輕易給別國利用的。他在一九七二年，環遊世界，希望爭取國際道義支持，「擺脫中共摧殘佛教的統治」，他要西藏成爲自主的獨立國。

錫金現在已給印度併吞了，是大鼻子慫恿印度的又一傑作；因爲，「錫金是通往中國西藏的交通要道」，具有重要戰略價值，形成了更進一步威脅中共的鉗形包圍，在這種形勢下，達賴喇

嘛又成爲有關方面的爭取對象——或者說是大可利用的角色，他今後的動向，無疑已是舉世矚目，他何去何從，會有怎樣打算？可從他最初的傾向，終至出走流亡中，尋到一點蛛絲馬跡。

說起達賴喇嘛，叫人同樣想起班禪額爾德喇嘛，他們兩位，同是西藏人民尊崇的活佛，也是西藏政府和人民的精神領袖。當一九四九年中共和席捲大陸，勢力很快伸展到西藏，一九五〇年，達賴帶了一大批黃金出走到錫金，據說，這批黃金價值，爲數驚人。誰知後來他和班禪都受到誘惑，應召到北京，做起西藏的代表，頗受一時的安撫。一九五六年，他們兩人還受印度政府邀請，參加在新德里舉行的「釋尊涅槃二千五百週年紀念大會」。那一次盛會中，我與他們有過一面之緣。他們兩位活佛都是二十五歲剛出頭的年輕人，中等身材，相貌清秀，風度翩翩，和藹可親，通曉英語，也懂點華語，對我們漢人佛教徒倒是蠻親熱的。同台坐在一起的，有主持大會的印度已故總統普拉薩，總理尼赫魯，錫蘭已故總理班達奈克（現任總理的丈夫），中共總理周恩來，錫金國王南吉爾，緬甸前總理宇帛等政要。他們各個領袖發表演說時，都一致強調佛陀是亞洲史上偉大的巨人，崇高的真理言教，將永遠受到世人的尊敬和信仰……

自那次盛會散後，班禪和達賴兩喇嘛順道朝禮過印度佛教八大聖地，回中國去了。聽說，班禪在北京住過一個時期，後來下落不明，迄今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命運如何？達賴則在一九五九年

三月十日那一天，出席拉薩（西藏首府）一個大規模羣象大會，他在會上發表重要演講，大聲疾呼，宣佈西藏爲獨立國家。於是中共對他大施壓力，他知道，在拳頭世界裏，沒有武力抵擋，他將會得到怎樣可怕的後果，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，他逃出西藏，到印度北部喜馬拉雅山的達南沙拉建立了他的行宮，一住十五年，他一直以六千萬西藏人民佛教與政治流亡領袖自居。

可是在當時，作爲東道主的印度政府，爲了避免觸怒中共，只能給達賴政治庇護，不敢公開承認他是西藏人民政治領袖，然而近年來，印度標榜的「中立」主義自己拆了台，一股腦投進大鼻子懷抱，便毫無顧忌，從暗地裏爲達賴撐腰，進而明目張胆作爲後盾，給達賴方便「行事」，有意無意頻頻協助「深入腹地運動」，及在外交上爲達賴拉攏某些關係。

顯而易見，達賴喇嘛在印度，已組織了一個流亡政府，他指揮着：復興與內政、宣傳與外交、宗教與教育等各個部門的首腦；他派有一個代表在紐約觀察聯合國的進展，他也在新德里設有一個辦事處。

達賴喇嘛，出生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，現年四十歲，爲西藏傳統活佛的第十三代轉世之身。照西藏密教法例，成爲「活佛」的喇嘛，在臨終前會指示門下弟子他轉世的特徵，可以世世代代生爲西藏活佛。當老達賴活佛故世後，他門下喇嘛們進行尋覓這位新達賴活佛時，發現這個孩子完全符合各種跡象，就把他從其家鄉帶到拉薩去，在喇嘛密教的訓練中長大，住在拉薩的寶塔拉宮，在象喇嘛的擁護協助之下統治西藏，成爲西藏人精神和世俗領袖，也就是宗教與社會雙重領袖。

在最近，他同有關訪客透露：追述從拉薩逃到印度的往事說：「單是作出逃亡決定，已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。那時候，中共已經控制了西藏大部份地區，我的逃亡決定，僅有幾位最親信的顧問知道。」

接着他感慨地說：「我們一行約十人，於夜間出走，穿着普通的西藏鄉民服裝，頭上包布，手持來福槍」，達賴說：「我與同行的人完全一樣，難以分辨。我也拿一把槍，因爲恐怕中共軍

看見我們會起疑；不過，我不會使用槍械，一旦被捕的話，我會將槍丟掉的」。

當然啦，活佛的慈心，就算爲了自衛，他也不會殺人，他平日戴着一副近視眼鏡，斯斯文文的慈祥態度。他說：「行程開始時，我們一行人涉過一條淺淺的河流；而附近就有中共軍駐紮把守，我沒有戴眼鏡，因恐被認識出來，我看不清楚，糶糶糊糊地，涉水時，時常踏到水中石塊而滑倒，發出撲通撲通的水聲，很耽心給守軍聽見。」

吉人天相，托佛慈護，他們終於離開了。後來改騎馬作長途跋涉到達西藏南部。達賴沉痛地說：

「起初我們並未打算逃到印度」，達賴喇嘛說：「我們只是要隱匿在西藏南部，希望中共的壓力會逐漸消失；但我在南部時，收到我私人秘書來信告訴我說：『拉薩人民正受着越來越大的壓迫』。我感到非常失望與痛心，我極關心那些被迫害的人民。」

那時候，達賴爲此憂傷成疾，而且中共軍隊已開始向西藏南部推進，他說：「我終於認爲無法可施，逃亡印度是唯一的去路」。同時他的顧問們也認爲要維持西藏人民的信心，唯一的辦法就是使達賴喇嘛能在西藏以外的地方生存下去。同時達賴本人也相信，他的流亡生活是有作用的，他說：

「西藏人民永遠不會接受中共的統治；人們總有一日會摒棄共產主義。西藏人民仍是民心激昂，尤其是年輕的一輩，他們繼續不斷地反對毛澤東的思想理論」。

達賴和西藏的人民形式上是隔開了；在精神上，他們還是一起的，所以他肯定說：「西藏人民從中共方面要獲悉我的消息和關於我的活動情形，他們聆聽中共的宣傳，作相反的推斷，就知道確實狀況。」

從達賴的談吐中，顯然有點厭倦作爲政治領袖的任務，他表示：「渴望能專心一志地恢復其在西藏佛教方面的精神領袖，以後把更多的時間去研究教理哲學和更多的時間去冥想。」他準備把政治上的任務移給別人；但他說：「迄今未能找到一個適合的人選。」

達賴的生活嚴肅。他每天一大清早就起身，先作兩小時冥想——冥想的意思，大概是禪思的參究工夫抑或密教的行法。現在他每天約花費四小時時間去冥想，但他認為還不夠，他說：「作爲一個佛教徒，每天應有好幾小時時間去注意自己的思想修持。」

活佛尙如此注重修持，平常人怎能不好好用功呢？而且他還自謙地說：「我不是一個冥想家，我盡力爲之；但沒有適當的成果。」當清晨冥想過後，他便開始用早餐，他笑笑說：「我也是一個人；所以必須填滿肚子」。

他像南傳佛教僧侶一樣，每天只吃兩餐，早餐和午餐。他於七年前成爲素食者。喇嘛佛教徒多不禁葷食的，而他又跟中國佛教徒一樣吃齋了。

早餐完畢，他到辦公室去，處理那些陸續不斷逃亡到印度來的西藏難民事務；他也在辦公室看書；並在相鄰的侍應室接待訪客。無事的時候，他便到住宅外去種種花，他種了許多花，不久就會盛開了。每當訪客看到他蹲在地上種花而弄得滿身泥污時，不免感到驚奇，而達賴喇嘛則覺得有趣，他說：「在拉薩時我也親自種花，有時常把手割傷或擦傷哩！」

一天工作完畢，達賴喇嘛如果有興趣的話，他會研讀一點英文，他於到達印度後，較注意英語的學習，現在已能講得很流利，並能閱讀英文報紙，但他仍喜歡通過通譯員對外人談話。

三月十日是他宣佈西藏獨立的紀念日，可是他並不作任何慶祝。不過散居在印度週圍的一些西藏部落的代表到達南拉沙拉，舉行手工藝品展覽會，及討論他們來到印度後的進展。除此而外，三月十日對達賴喇嘛來說，是一個跟平常一樣的日子。

（上接第15頁 中國佛教之特色）  
，首先是佛家哲學本身，它是精深而圓融的。所以能超越時間和空間，而與中國文化融成一體。——此爲根本原因。其他因素畧言之有如下五點：

（一）思維方式相同——印度，中國哲學，同屬東方向內的反省的思維方式。故佛法東漸易爲中國所接受及融會。

（二）與方術之相附——漢代今文經學陰陽五行化，圖經，讖緯方術之盛行與佛教之「神通」「數息」等相依附，有助佛教立足於中土。

（三）與玄學合流——迫於今文繁瑣章句，而於魏晉產生了玄學，玄學與般若學在某些地方比較相似比較接近，互相合流，故彼此推動，促使佛學在中國發展與流布。

（四）歷史環境——東漢末年至隋唐統一，其間之中國社會，政治黑暗，戰亂頻仍，民不聊生，一方面使知識分子不求聞達，喜談玄學及投歸佛學，另一方面使當時人們能較直接地對佛教的理論和理想，而有切身之體會和嚮往。

（五）慈悲與淡泊精神——佛教以離苦，解脫，見自性本來面目爲理想，故其實踐精神對自則淡泊，對他則慈悲。此淡泊與慈悲有助國家風化，爲民所喜歡，爲帝皇所提倡。

佛教能東漸爲中國所接受，並融會中國文化，支配中國心靈思想，其影響深而遠，究其因大抵如是。

但究實而言，佛學是世界性的，因爲佛家哲學所要解決的是人生，最後的生死問題，「人生」是世界性普遍性的，無所謂「印度人生」，「中國人生」。故亦無所謂「印度佛學」，「中國佛學」。所謂「中國佛學」，乃就其特色而言耳。

## 多一定戶，多一份力量，多發揚一份佛教文化之光！